



# 梁启超的导读书目与导读思想\*

□刘旭青 赵俊玲

**摘要** 梁启超是开启近现代目录学研究一代风气的启蒙人物,他对导读书目的研究分成了西学书目与国学书目两大类型,并形成宣传西学与推崇国学两个明显的历史分期。梁启超开启的导读书目范式更加强调对读者、读物、读书法等的关注,带有突出的读者服务意识。梁启超的导读书目根植于中国目录学传统,开创了解题兼导读的新型书目,导读的范围兼涉中西,体现出明显的致用属性。

**关键词** 梁启超 导读书目 导读思想 目录学

**分类号** G25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4.01.014

“书目是著录、揭露和评论图书的工具”<sup>[1]</sup>。书目在客观上起着导读的作用,但此项功能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落实。导读书目是书目的一种类型,也称推荐书目、选读书目、举要书目。导读书目具有目录的一般功能,同时放大了书目的导读、推荐价值。我国最早具有导读性质的书目是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中的《历代众经举要转读录》。唐末,出现了专门为青年学子开列的书单,可见于敦煌出土的小型类书《杂钞》中。其后,随着科举制度盛行,以及书院、家塾等的发展,导读书目得到逐步发展。例如,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清·龙启瑞《经籍举要》和张之洞《书目答问》等。相对于其他常见的官修、私修书目,导读书目的数量远远不足,也并没有形成风气<sup>[2]</sup>。梁启超曾在导读书目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及实践,并且形成了较为突出的思想体系。作为晚清、民初活跃于政坛、文坛的一代大师,他一生淹贯经史,参驳古今,在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等诸多方面均有开拓性研究,著述达140多卷,1400多万字,收编为《饮冰室合集》行世,后世称其为“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sup>[3]</sup>。本研究以梁启超的导读书目为核心,结合他与导读书目相关的其他论著,探讨了梁启超的导读思想,以期为当今社会导读书目编撰与导读事业发展提供思

想和理念层面的借鉴。

## 1 双重体裁:西学书目与国学书目

作为一名文化大师和启蒙学者,梁启超一生将大量精力放在了目录学研究上<sup>[4]</sup>。在其众多目录学研究成果中,导读书目最有特色,影响也最大。从类型上看,他的导读书目集中在新学西学书目、国学举要书目两大领域,两大导读书目题材基本反映其导读书目的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致力于西学导读书目的研究,宣传西学。梁启超的新学西学书目主要是《西书提要》(1896年)、《西学书目表》(1896年)、《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1897年)、《东籍月旦》(1899年)等。研究导读书目的初期,是梁启超作为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爱国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图存的真理,倡导和运用西学的成果体现。甲午战败后的中国社会面临列强瓜分的危局,处于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斗争环境中。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同康有为等一批有识之士提倡西学,利用目录学方法发凡起例,推荐西书,服务于变法维新。民族危亡之际他曾不遗余力地呼吁国人了解、学习西方现代政治体制、科技教育,号召“多译西书”“多读西书”<sup>[5](123)</sup>。同时他也认识到,举全国才智去学习西文、阅读西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阅读推广学术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20BTQ007)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刘旭青,ORCID:0000-0002-8868-7358,邮箱:hbliuxuqing@163.com。



籍,“则其事又迂远,恐有所不能待”<sup>[6]</sup>。为了更好地宣传西学、让国人尽快了解西书,梁启超认为唯有通过目录学这一途径,“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sup>[7](1202)</sup>。书目工作是架在译著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导读书目就成为梁启超宣传西学的一大突破口。

第二阶段转向国学导读书目,宣传国学。梁启超的国学举要书目以《读书分月课程》(1894年)、《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书法》(1923年)、《要籍解題及其读法》(1923年)等为代表。此外,《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1923年)、《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1925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1926年)、《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1926年)、《图书大辞典薄录之部·官录及史志》(1927年)等为与其导读思想直接相关的目录学研究著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政治上转为“保守派”。1919年,梁启超曾到西欧各国游历考察,他深感西方文明因“一战”所带来的创伤,城市凋敝、人民涂炭、道德沦丧。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让梁启超认识到基督教文明丧失了道德力量,宣传物竞天择、科技革命的西方文化反而成了发动战争和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sup>[8]</sup>。同时,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给新学、旧学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青年学生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他们一方面向往以“德先生”“赛先生”代表的新学,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只读西书,但面对瀚如烟海的古籍却又无从下手。1923年,他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说:“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广大之必要”<sup>[7](632)</sup>。晚年他曾任教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指导过目录学研究生,教授“群书概要”等课程,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是其关注的重点<sup>[9]</sup>。此时期梁启超降下了启蒙西学的大旗,转而成为捍卫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热衷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整理与发掘<sup>[10]</sup>,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再一次将导读书目作为传播思想和文化的工具。

## 2 范式转型:梁启超导读书目研究视域的拓展

若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提要目录作为传统目录的范式,梁启超的导读书目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近代中国文化典范,代表着古典目录学向现代

目录学的过渡。古典目录学的价值端在整理者一方,自梁启超开启的导读书目转向了读者一端,具体体现在对读者、读物和读书法的关注,在目录学上完成了一次范式的重铸。

### 2.1 读者:导读面向的服务主体

梁启超将目录学功能指向读者这一主体,认为目录学最重要的价值是指导读者阅读。他在研究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的基础上提出“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sup>[11](356)</sup>。传统的目录学家关注的重点多在通过著录一代典籍,反映一代学术和文化,或单纯追求“炫奇示博”“宋元旧壑”。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图书馆的建立和文献传播手段的革新,古典目录学的传统职能已不能充分满足新环境与新需求。在此背景下,梁启超敏锐地观察到古典目录学转型的必要性,他对读者的关注更接近于西方现代目录学重实用、为读者服务的思想理念,这是对目录学职能的拓展和重新界定,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古典目录学的理论体系,开启了从以文献整理为核心的古典目录学向以读者为中心的现代目录学转变的序幕。

梁启超的导读书目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求和特点,有着针对性的受众。例如《西学书目表》指出“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以略识门径”<sup>[5](126)</sup>。《东籍月旦》“虽无大裨于时彦,抑不至贻误于后生”,“第一章伦理学”序言中指出“此专属中学第四第五年级者”,对部分所列的参考书目,指明是“中等教育”专用<sup>[12](84-85)</sup>。此外,针对读者群体,梁启超号召设立读书学会。因“学者一人独立难以成学,或力量不能备购各书”<sup>[13]</sup>,设立读书学会则是迫切需要的一项工作,“大会固不易举”,然而成立“数十人”“十余人”“三四人”的“小会”则是可行的。他对读书学会的号召立足于读者实际,结合针对性的受众,既为读者提供读书的组织,也为读者提供群体阅读的方法。

### 2.2 读物:导读面向的内容客体

向读者推荐书目,应该有“适应群众要求”<sup>[14]</sup>的读物这一客体。西方国家之所以发达,因其“一切条教号令,备哉灿烂。实为致治之本,富强之由”<sup>[5](123)</sup>。可见,“书之备与不备”<sup>[5](122)</sup>是区别中西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大因素,因此他号召多译西书。在图书的选择上,一方面反对“爱古薄今”的收录态度,提出目录的收录范围应以现存和新出版图书为主要的观点。另一方面重视“国故”,称其为“丰富矿穴”,“非分段



开采不能成功,非一直开到深处不能得着宝贝”<sup>[15](174)</sup>。他以目录学家严谨求实的态度,极力反对传统书目中的收录弊端,但也并不以自己推荐西学、新学而对前代书籍不收或少收。例如,《西学书目表》服务于维新变法,动员国民学习西学,推荐领域虽然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历史、科学、技术等众多方面。但并非见西书就著录;不以版本精良作为选录标准,而是看重于新书;对于“市侩射利之所为,方闻之士不屑道”<sup>[5](125)</sup>等不利于社会变革、束缚国人思想的图书不予收录。

突破对读物的传统分类体系与编目方式。梁启超的导读书目已跳脱出传统分类的桎梏,以方便读者起见,对图书进行科学分类。《西学书目表》是新学目录的一大典范,一改已为永制的四部分类,分为学、政、杂三类,下分28小类。此种分类方法是梁启超结合近代西方学术分科观念与图书分类的原则,创新构建的分类体系,在中国图书分类史上尚属首次。其后被《古越藏书楼书目》《译书经眼录》《东西学录》等继承和发展。基于自身的学识水平及对图书的了解<sup>[16]</sup>,梁启超在著录事项和体例上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同样以《西学书目表》为例,初版的著录事项包含书名、撰译者、版刻、本数、价格、识语、圈识等项,“卢刊本”还增加了撰译年号。正表部分著录图书357种,其中带有圈识的达300种,开启了以“:”“—”等符号作为分类标识的萌芽,“○”数量的多少表明重要程度。此书“概标本数,不标卷数”,“标译人不标撰人者,所重在译也”<sup>[5](124)</sup>。《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及史志》中不少书名标有“△”“▲”两种三角,以表示图书的完阙及版本情况。此外,以往“目录家皆不著价值,盖所重在收藏”,《西学书目表》《东籍月旦》转变过去仅注重收藏、版本的做法,注明图书的价格,这无疑对“取便购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 2.3 读书法:主体与客体间的桥梁

目录学价值导向的变化自然会提升对读书方法的认识,从而加强对读书法的研究。梁启超认为仅有解题的目录是不够的,还需给读者提供导读的方法。或如《西学书目表》,在其后附以数十则《札记》,名为“读西学书法”;或如《东籍月旦》,在其中插入读书法。《读书分月课程》《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目也均在不同位置有读书方法的论述。梁启超期望学子“磨炼自己的读书能

力……并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sup>[17](3)</sup>,而不是单单给学生“一掌图书馆书目”<sup>[18]</sup>。导读书目加上所附的读书法,其实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书目推荐功能体系。具体而言:

第一,明确读书次第,合理编排阅读计划。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都应该“有识抉择”,明确“某科当先,某科当后”“某书当先,某书当后”<sup>[12](63)</sup>。例如,在中学和西学的先后次第上,他主张中西兼读应先中后西,“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sup>[19]</sup>，“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sup>[20](377)</sup>。同时,阅读讲求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主次顺序。《读书分月课程·最初应读之书》中“言其简要易入之道”“宗而录之”<sup>[21](4)</sup>。《读书分月课程》所列的经、史、子、理、西五大类最初应读之书均有先后次第,而且按月制定了直观简单、容易掌握的“读书次第表”,以便初学。

第二,“略言各书的长短”的识语可以引导读者更好地阅读原书。如《西学书目表》区分为不可不读、不必读或可不读、可先读、可缓读、初学宜读、难读等类型。《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区分为熟读成诵、精读、浏览、应读、可读、不可读、备参考、并读等类型。《东籍月旦》中有“熟读成诵”“择读”“宜精读”“宜浏览”等阅读深度的推荐,“甚好”“极有价值”“可供参考”等阅读内容的价值衡量。

第三,精读与涉览相结合。他指出“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涉览的”<sup>[22](25)</sup>。为贯彻“读书经世”的思想主张,提出应对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对其中具有“永久价值”的进行精读;为了解决典籍与读者之间的矛盾,他提出了选读的主张。他认为首先要在明确阅读目的基础上确定选书标准,再确定阅读的先后次序及具体内容,即使是正经、正史的“精要之处,不过十之一二”,因此选读是十分必要的,“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sup>[20](378)</sup>。关于精读与泛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学问固贵专精,又须博涉以辅之”<sup>[23]</sup>，“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sup>[24]</sup>。因此,针对《西学书目表》中所列的三百种书目,可“择其精要而读之”<sup>[5](123)</sup>。《治国学杂话》中还希望学人对于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有益身心的格言熟读成诵。

第四,阅读与读书笔记相结合。梁启超认为“读



多自能属文”,主张青年以著述为志,阅读应该与写作相结合。有了写的立意,读书则会更加“经心”。“斐然当述作之誉”,“也是实际上鞭策学问的一种妙用”。“抄录或笔记”是“极陈旧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sup>[22](29)</sup>。读书笔记是以写促读的好办法,“无笔记则必不经心,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sup>[21](4)</sup>。

### 3 思想探源:梁启超导读书目思想源流的解析

梁启超的导读书目研究突破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局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体现出更多服务于读书治学的致用价值。他的导读书目与导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清晰的学术与思想脉络。

#### 3.1 裨益读者:着力提升导读书目服务意识

他对读者的关注体现出明显的读者服务意识,带有明显的现代目录学、图书馆学研究特色。读者、读物是梁启超在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提出的两大核心要素,而导读书目、读书法正是搭建起二者间桥梁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他从古典书目中挖掘导读书目的思想根源。在长期的书目实践中,他的研究涉及佛经目录、官修目录、私家目录等,对其所揭示的导读思想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对导读书目的认识曾受益于张之洞的导读书目,“年十一,游坊间得张南皮师之《轺轩语》《书目答问》,归而读之,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sup>[25]</sup>。针对导读书目收录内容,他赞同康有为“因《汉志》之例,撮其精要,翦其无用”<sup>[26]</sup>的做法。他将佛教内典录中“众经举要转读录”视为导读目录的雏形,称其为“最有价值之创作”“裨益于读者实不少”<sup>[11](356)</sup>,从曾被忽视的佛经目录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关注读者需求与年龄特色。例如,他以传承国学为宗旨,针对不同层次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在国学学习程度上进行层级划分<sup>[27]</sup>,涵盖了国学范围界定、书目筛选、读者的分级与分类等。《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正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打破成例,以西方科学手段和思想整理、研究国学的经验结晶,适合于当下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学生研读<sup>[28]</sup>。

#### 3.2 返本开新:开创解题兼导读的新型书目

梁启超的导读书目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目录学基础上的创新与发扬。“有解题”<sup>[29]</sup>是中国目录学一大特色,历代备受目录学家推崇。传统导读书目中

的解题较为简单,一般著录作者、版本等,对读书方法偶有论述,对图书内容的深层揭示较少,书目的推荐性要大于导读性。《读书分月课程》《西学书目表》等梁启超早期的导读书目,更多是对传统书目解题的继承。到《东籍月旦》,采取了编、章、节三级分类的现代著述体例,对编、章、节的介绍充分吸收了传统目录学大小序、解题的优良传统,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对书目展开导读,真正形成解题兼导读的书目类型。此种注重解题的导读书目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解题的内容更为丰富,其篇幅之大、内容之详都是之前导读书目所未有的,“不能不谓为适应于时代迫切的要求”<sup>[17](2)</sup>,“其精详实有甚于前人读法底部分,对于读者更有切实的指导”<sup>[30]</sup>。例如《诗经》的解题包括了“诗经之年代”“孔子删诗说不足信”“诗序之伪妄”“读《诗》法治一、二、三”“说《诗》注《诗》之书”等,其中前三项是传统解题中的考证、辨伪,而其后则是对解题范围的扩充。此种解题兼导读的书目,在继承中国古典目录学解题的基础上,结合导读书目的功能及所肩负的阅读任务,探寻一种适合新时代阅读的解题新体制,深深影响了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和走向。

#### 3.3 兼涉中西:在批判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西学与中学的问题上,梁启超并不是走向了两个极端。日文的学习,让他认识到“广求知识于寰宇”<sup>[31]</sup>的重要性。但他并非狂热的新学激进主义者,推荐西学而非“全盘西化”“沉醉西风”<sup>[15](184)</sup>,更不是单纯守旧的国学卫道之士。从其初期对西学书目的推广,到后期国学书目的研究,他采取的是一种兼涉中西、博采众长的导读方式。“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sup>[32](105)</sup>。无论“舍西学而言中学”,还是“舍中学而言西学”<sup>[33]</sup>,均是不可取的。“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sup>[22](28)</sup>。对传统学术在弘扬中批评,这是梁启超秉持一贯的学术理念。

对西学和中学前后两个阶段的推荐并不是割裂的。为了复兴、弘扬国学,他利用导读书目来宣传其政治思想和文化,借此来引导和教育民众。这和他前期撰写西学书目、引入西学文化的思想和目的是高度一致的,成为他一生的学术宗旨和追求。相较于前代目录学家,梁启超将书目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是明显的有意识行为。他所坚持和宣扬的理念,



是基于目录学本身的文化学术性与工具性,古典与现代的融通性,中西方结合的兼容性。前期对新文化、新技术的宣传,与后期对传统国学的导读,二者在梁启超身上并不冲突。

从西学向中学的回归并非退居其早年维新思想的原点,而是着手打造一种新文化<sup>[34]</sup>。举荐的虽是西书,却充分继承了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特色;导读的内容虽是古书,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却都体现出一个“新”字。他站在东西文化比较的高度审视西方科技和文化,并对传统国学进行重新整合,使其走出传统的、狭隘的“圣经贤传”式的壁垒,促使国学向科学化、现代化迈进。“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sup>[35]</sup>,梁启超形象地称之为中西文化“结婚”,创造出第三种文明。

#### 3.4 经世致用:以导读书目服务于政治理想

梁启超在治学上的变化是与其政治活动及政治思想是相统一的<sup>[36]</sup>,他的政治思想是其导读思想的灵魂。作为中国历史上利用导读书目宣传、推荐西方文化和图书的启蒙人物<sup>[37]</sup>,他利用导读书目为维新变法服务,这是导读书目领域从未出现的新变化。无论他是否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导读书目始终是其表达理想的一大工具。导读书目和其背后的思想理念更是与其政治理念一脉相承,“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sup>[38]</sup>。此时对导读书目的研究已超出传统的读书、治学范畴,其目的不仅仅“为经学而治经学”,而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sup>[32](6)</sup>。从书目的性质看,任何一种书目类型均有宣传与报导某种文化的作用。导读书目的一大特色是作者具有利用书目传播文化的明确意识,并将其作为传播的手段<sup>[39]</sup>。导读书目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思想性,梁启超将导读书目作为一种战斗武器而与世抗争,将书目导读的功用上升到学者自立、国家自强的高度<sup>[40]</sup>。此种导读书目与导读思想无疑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政治和文化观念,并借此开启民智。他充分肯定了导读书目在指导阅读方面的功用,这也是第一次将导读书目与政治、民智建立起如此密切的关联,无疑使得导读书目的社会功用更加凸显,为导读书目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sup>[41]</sup>。

#### 4 结语

“学问所以能救世者,以其有精神也”<sup>[12](86)</sup>。梁

启超自称“哀时忧国之念则至老不稍衰”<sup>[42]</sup>,世人称其“笔尖常带感情”,其中包含了他对学术事业的热爱及对社会改革的热情。梁启超在导读书目及在导读思想方面扮演着启蒙者和开拓者的角色,每部书目均是密切结合当时社会现状,在目的与体例上均有十分明显的时代特色,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脉搏紧紧相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的一大缩影。他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研究进入新目录学时期的序幕,在继承和发扬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当然,梁启超的导读书目及导读思想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任何一名目录学家也不可能逃脱其时代背景及阶级特色<sup>[43]</sup>。我们应该肯定的是,梁启超对导读书目的研究及其所反映的读书方法、导读思想,对今天的导读书目、目录学教育、国学教育,乃至全民阅读事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 王重民.中国目录学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84:1.
- 2 刘旭青,柯平.目录学知识在阅读推广活动中的应用价值[J].图书馆论坛,2019,39(6):133-138.
- 3 李喜所.《饮冰室文集》序言[M]//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儒家哲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
- 4 翟桂荣.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之影响[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0,38(4):119-126.
- 5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57.
- 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8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1-9.
- 9 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4):160-161.
- 10 董德福.简评二十年代的两份“国学书目”[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56-61.
- 11 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M]//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2 梁启超.东籍月旦[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
- 13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M]//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北京:朝华出版社,2018:117.
- 14 梁启超.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42-49.
- 15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M]//梁启超.读书指南.北京:中华



- 书局,2010.
- 16 李万健.梁启超对我国目录学的开创性贡献[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3,(2):16-21,92.
- 17 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 18 梁启超.评胡适之《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M]//梁启超.读书指南.北京:中华书局,2010:186.
- 19 梁启超.学校余论[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129.
- 20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M]//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 21 梁启超.读书分月课程[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2 梁启超.治国学杂话[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
- 23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M]//梁启超.读书指南.北京:中华书局,2010:23.
- 24 梁启超.读书次第表[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六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11.
- 25 梁启超.变法通议[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55.
- 26 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53-54.
- 27 曾光光.近代学人从书目角度对大学国学教育的思考[J].社会科学文摘,2016(10):96-98.
- 28 来新夏,柯平.目录学读本[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318.
- 29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3:298.
- 30 蒋伯潜.校讎目录学纂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8.
- 31 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80.
- 3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3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129.
- 34 刘明档.评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76-79.
- 35 梁启超.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35.
- 36 谢俊贵.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J].江苏图书馆工作,1982(2):60-62.
- 37 赵士桓,杨碧.浅谈梁启超目录学思想和成就[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4):66-71.
- 38 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M]//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51.
- 39 彭树欣.试论文化传播与梁启超导读书目的发展[J].图书馆论坛,2008(3):5-7,21.
- 40 张喜梅.谈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目录学的贡献[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2(5):85-86,103.
- 41 郑永田.试论梁启超近代目录学思想[J].图书情报工作,2007(2):135-138.
- 4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序3.
- 43 梁启超.读书指南[M].北京:中华书局,2010:1.
-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0日  
修回日期:2023年12月24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 Liang Qichao's Guiding Bibliography and Guided Reading Thought

Liu Xuqing Zhao Junling

**Abstract:** Liang Qichao was an enlightening figure who opened age of generation of modern bibliography research. His research on the guided reading bibliography was divided into two types: Western bibliography and Chinese bibliography, and form two distinct historical stages: promoting Western studies and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guided reading paradigm initiated by Liang Qichao emphasizes more on attention to readers, reading materials, reading methods, etc., with a prominent reader service awareness. Liang Qichao's guiding bibliography i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creating a new type of bibliography that combines summary and guidance. The scope of guiding bibliography cover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reflecting an obvious attribute of utility.

**Keywords:** Liang Qichao; Guiding Bibliography; Guiding Reading Thought; Bibliography